

DOI:10.13318/j.cnki.msyt.2025.01.023

从脊头瓦到兽头

——北朝至宋元时期中国古代建筑脊端装饰瓦件的演变

王子奇

内容提要: 用于中国古代建筑脊部端头的兼具构造功能和装饰意味的瓦件,自北朝隋唐到宋元,经历了从较为平面化的脊头瓦逐步向较为立体化的兽头的转变。随着这一转变过程,兽头的形象还出现了分化,可以用于古代建筑脊端的不同位置。通过对从兽面瓦到兽头的分析,既初步总结了其时代演变规律,也初步梳理了其装饰意涵,并对考古遗址出土瓦件的分析 and 仿古建筑脊饰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脊头瓦; 兽头; 脊饰; 瓦件

中国古代建筑屋面的转折处或屋面与墙面等的交接处,在屋面工程中是一个关键部位,由此产生了屋脊,着意使用瓦(或砖)、灰等材料做成构筑物。其中,各脊交接或尽端处,尤其成为屋面工程中关键性的节点,在营建过程中被予以重视。除屋面防水外,屋脊很早就开始具有一定的装饰作用,例如屋脊勾勒出了建筑的整体轮廓,有较强的艺术效果;并随着古代建筑的发展,逐渐在屋脊上施用兼具构造和装饰功能的脊饰,[1]还引发出一一定的等级意义。

在脊部端头的构造节点,以往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是正脊两端的瓦件,其中高等级建筑以所用鸱尾(鸱吻)最受关注。[2]除鸱尾(鸱吻)以外,屋脊上具有很强装饰效果的还有脊头瓦或兽头,也往往用于高等级建筑中。在可以用鸱尾的建筑中,脊头瓦或兽头往往与鸱尾相配套,主要用于垂脊、戢脊的两端。在一些等级上不能使用鸱尾的建筑中,兽头还往往用于正脊两端。本文即主要分析中国古代建筑中从脊头瓦向兽头的转变,及其在建筑屋面不同位置可能的差异。

一、从脊头瓦到兽头

主要用于建筑垂脊和戢脊端头的



图1 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墓葬门楼图局部
(采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图2 汉魏洛阳城遗址出土脊头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供图)

装饰性瓦件的形态经历了从平面逐渐立体化的发展变化过程,总的来看北朝至唐代中期基本为较为平面的脊头瓦,往往装饰兽面纹样,常常被学者们称为兽面瓦(也有学者称为兽面砖,日本学术界习称“鬼



图3 河北邺城遗址上柳村附近采集脊头瓦
(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邺城文物菁华》第88页)

瓦”)。[3]这类脊头瓦所使用的位置可以参考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晚期墓葬的门楼图,其上可见清晰的兽面纹样脊头瓦图像(图1)。

北朝时期脊头瓦时代较早的实物,如北魏洛阳城一号房址[4]和永宁寺遗址[5]出土者,其中一号房址出土的兽面脊头瓦保存较为完整,兽面雕塑立体,瞪眼竖耳,张口獠牙,脊头瓦上部为圆弧形,下部方形(图2)。河北邺城遗址近年出土或采集的脊头瓦,整体面貌与此类似。例如上柳村附近采集的脊头瓦,整体也为上圆下方,与北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出土的脊头瓦相近(图3)。但兽面形态已有变化,兽面两侧鬃毛上卷,兽面嘴部两侧作出两个兽爪。[6]新近在宫城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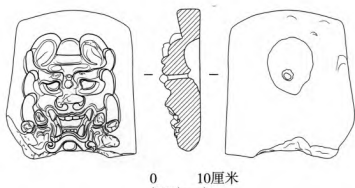


图4 河北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206号大殿基址及附属遗迹出土脊头瓦(采自《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206号大殿基址及附属遗迹》第6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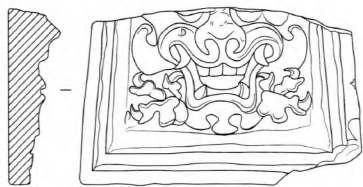


图5 河北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206号大殿基址及附属遗迹出土脊头瓦(采自《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206号大殿基址及附属遗迹》第67页)

掘出土的脊头瓦(图4、图5),形态、纹样也与此类似,其中一件还在兽面额部正中有一穿孔,或许和脊头瓦在屋面上的固定方式有一定关系。[7]

稍晚开始出现长方形或梯形的脊头瓦,纹饰除兽面纹样外也开始出现植物纹样。在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三号遗址出土一件长方形陶制构件,外周一圈联珠纹,其内饰一圈素面凸棱,内部饰莲花、卷草簇拥摩尼宝珠纹样,发掘者推测这件可能是一件“脊头砖”(图6左)。[8]按类似的纹样在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出土铺地石上也出现过(图7),这件植物纹样的脊头瓦时代可能较早,或为隋代。三号遗址周边还出土多件梯形脊头瓦,形态也与前述邺城遗址出土的较为近似(图6右)。

唐代遗址尤其是长安、洛阳两京遗址的考古工作中发现的脊头瓦个体较多。其中,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上圆下方形式的脊头瓦一直沿用到唐代前期,唐长安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即出土一件(图8)。[9]更多的则为平面长方形或梯



图6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三号遗址出土脊头瓦(采自《隋仁寿宫·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图版七二,1,3)



图7 河北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206号大殿基址及附属遗迹出土铺地石(采自《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206号大殿基址及附属遗迹》第6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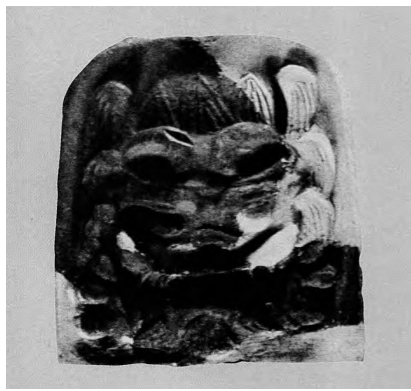


图8 唐长安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出土脊头瓦(采自《唐代大明宫》图版五六,2)

形的脊头瓦,纹饰及构图多相似,外周常见一圈联珠纹装饰,兽面怒目圆睁,张口獠牙,两侧鬃毛卷曲,上部常见二角,部分在嘴部两侧饰二兽爪(图9-12)。

这样的脊头瓦不仅在长安、洛阳城内发现较多,在长安周边的唐代帝陵也多有出土(图13)。[10]此外,还在陕西富平的唐代窑址中发现, [11]富平桑园唐代窑址的发现不仅提示了关中东部地区唐代帝陵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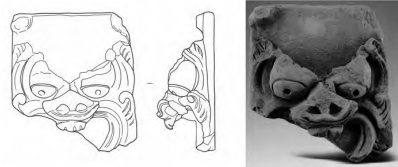


图9 青龙寺出土脊头瓦(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青龙寺与西明寺》,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65页,图版二一)



图10 西明寺遗址出土脊头瓦(采自《青龙寺与西明寺》第139页,图版五七)



图11 隋唐洛阳城东城砖瓦窑出土脊头瓦(采自《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4册彩版34)



图12 隋唐洛阳城上阳宫遗址出土琉璃脊头瓦(采自《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4册彩版70)

建所用砖瓦的烧制地点,下举两种不同形式脊头瓦的共存关系还提示我们有无联珠纹、有无兽爪都不是兽面纹样脊头瓦年代早晚关系的关键因素(图14),分析兽面纹样脊头瓦的时代早晚主要应从脊头瓦形态和兽面纹饰的演化着手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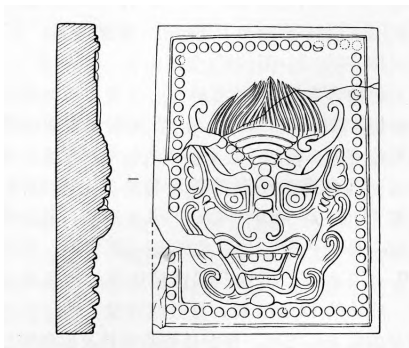


图13 唐代帝陵出土脊头瓦(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出土,采自《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第11页;中、右:唐肃宗建陵出土,采自《唐肃宗建陵出土一件兽面脊头瓦》第112页)



图14 陕西富平三原(桑园)村唐代窑址出土脊头瓦(采自《陕西新出土文物选粹》第115、116页)



图15 2003年隋唐洛阳城温柔坊遗址出土兽头(采自《魅力洛阳:河洛地区文物考古成果精华》第83页)



图16 渤海上京城出土兽头(左出自皇城南门,右出自2号宫殿,采自赵哲夫、李陈奇《渤海三彩:渤海上京城出土陶陶》,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9、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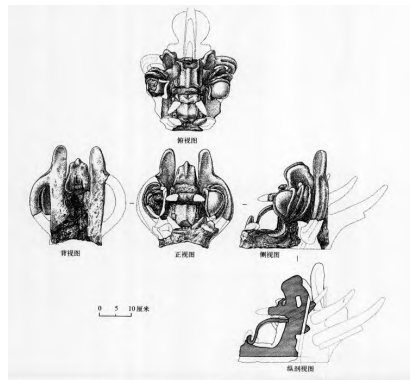


图17 西古城一号宫殿遗址出土绿釉兽头(采自《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第126页)



图18 广州南汉时期遗址出土兽面脊头瓦(采自《铁积寸累:广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选萃》第206页、《南越国宫署遗址:岭南两千年中心地》第160页)



图19 广州南汉时期遗址出土建筑脊饰(采自《南越国宫署遗址:岭南两千年中心地》第156、157页)

自唐代中后期开始,较为平面化的脊头瓦逐渐开始被形象更为立体的兽头所取代。这一趋势从上举唐肃宗建陵出土的脊头瓦就可以反映出来(图13右),这件脊头瓦通高26、下宽27厘米,兽面纹饰向外鼓起呈弧形,与之后的背板形成一个空腔。兽面纹饰更加富有立体感,五官比例较昭陵出土脊头瓦更加夸张。进一步发展,即表现为隋唐洛阳城温柔坊遗址出土的兽头形象(图15)。这件兽头高37.2厘米,兽面样式仍为张口獠牙、怒目圆睁,鬃毛卷曲、上出两角,但兽面狰狞夸张、高高凸起,已完全摆脱了平面化的限制,展现出立体的形象了。[12]

这一趋势从渤海上京城[13]和西古城、[14]八连城[15]出土资料可以得到更加充分地反映。[16]渤海诸城址出土兽头琉璃(釉陶)、灰陶皆有,集中表现为张口獠牙、怒目凸眼、上竖双角,可以看出明显受到了唐代中后期兽头的影响,并进一步立体化(图16、图17)。当然,这里所指出的是总体的发展变化趋势,在不同地区的情况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在广州地区南汉时期遗址中发现的一类兽面脊头瓦,就仍相对较为平面化(图18)。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南汉时期发现的建筑脊饰,有不少也已经开始高度立体化,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图19)。[17]这似乎也反映出南汉建筑脊饰保有较为传统和创新发展的不同因素。但南汉时期的这种高度立体化的脊饰,未能得到继续发展,再次普遍出现如此立体化的垂脊、戣脊兽头,要等到元代之后了。

二、辽宋金元时期兽头的演化

辽代早期发现的兽头较多地受到了渤海的影响,进一步表现出立体化的特点,如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黑龙门遗址出土的兽头(图20),正视比例接近方形,表现出的变化趋势是兽嘴大张,上颚进一步前伸。[18]这一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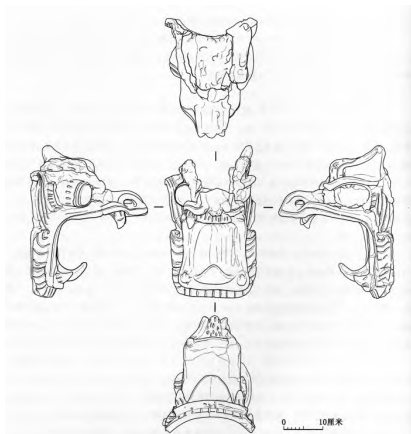


图20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黑龙门遗址出土兽头(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辽祖陵黑龙门遗址发掘报告》)

点在辽代发现的兽头上得到了继承(图21),辽代晚期的实例可以下葬于寿昌二年(1096)的辽宁北镇耶律弘礼墓出土兽头作为典型代表(图22)。^[19]

耶律弘礼墓出土兽头值得注意的现象除兽头的整体风格外,还有其形态及使用位置的细微差别。耶律弘礼墓共出土兽头六件,简报中“根据使用位置和功能的不同”将其分别称为望兽、垂兽、戢兽,可知每种各2件,其中简报所称望兽、垂兽形态相似,均作张口状,但戢兽则作闭口状。耶律弘礼墓墓门仿木构砖雕,模仿的是一处歇山顶建筑(图23),简报称发掘时1件戢兽尚在原位,因知其位置报道是准确可信的。这就提示我们辽代歇山顶



图21 辽宁北镇市新立遗址一号基址出土的绿釉兽头(采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辽宁北镇市新立遗址一号基址2015-2018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11期)



图22 辽宁北镇辽耶律弘礼墓出土兽头(采自《辽宁北镇市辽代耶律弘礼墓发掘简报》第54页)

建筑中,已经开始对垂脊端头和戢脊端头的兽头形态加以区别。这一情况在山西朔州崇福寺金代建筑弥陀殿的屋面组合中也可以见到(图24),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相较而言,目前已经发现的宋代兽头,不仅较唐代中后期以来的兽头更加立体化,同时比例上也更加修长。兽头后部形制近于板瓦的陶制背板,往往做得较长,特别是在兽头下部之下长出较多,其上刻画出鬃毛、鳞片等纹样,兽头的双角也向上盘曲,较为修长,还往往在兽嘴中做出弯曲的长舌。北宋实例可以北宋皇陵钦成朱皇后陵、永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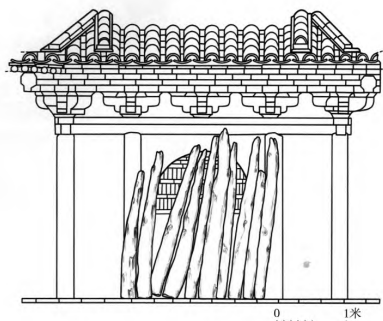


图23 辽宁北镇辽耶律弘礼墓墓门(采自《辽宁北镇市辽代耶律弘礼墓发掘简报》第42页)



图24 山西朔州崇福寺大殿脊饰配置



图25 北宋皇陵(左)和洛阳宋代衙署庭园遗址(右)出土兽头(采自《北宋皇陵》彩版八、《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四册彩版36)



图26 浙江绍兴兰若寺大墓出土兽头



图27 宁波东钱湖庙沟后石碑坊兽头配置及细部(采自《南宋石雕》第118、119页)

陵上宫、元德李后陵陵园等处和洛阳宋代衙署庭园遗址出土兽头为代表(图25)。^[20]这类兽头的形象,



图 28 山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垂兽(采自《山西琉璃》图版 16)



图 29 太子城遗址(左)和宝马城遗址(右)出土兽头(左图采自《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右图赵俊杰先生提供)



图 30 山西永乐宫重阳殿翼角



图 31 山西永乐宫元代建筑三清殿翼角

在宋代绘画如传赵佶《瑞鹤图》等中,也可以得到清晰的反映。

南宋和金代的兽头,基本沿袭了北宋兽头的风格。南宋出土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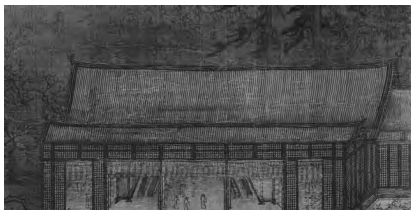


图 32 马远《华灯侍宴图》局部



图 33 (传)李嵩《水殿招凉图》局部

可以浙江绍兴兰若寺大墓出土兽头为代表(图26)。此外还可以在浙江地区现存的南宋至元时期的仿木构建筑上见到,如宁波东钱湖庙沟后石牌坊单檐歇山顶,正脊两端和戗脊端头的兽头尚保存于原位(图27)。^[21]

金代兽头地面建筑中尚有部分实例,如前述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兽头^[22](图28),考古出土的遗物可以太子城遗址^[23]和宝马城遗址^[24]出土实物为代表(图29)。其中,宝马城遗址出土了多件兽头,有些兽头作张口状,有些作闭口状。参考前述耶律弘礼墓和朔州崇福寺弥陀殿殿顶兽头的做法,可以推知这些不同形制的兽头中,当有一部分源自祠庙内歇山顶建筑的不同位置。

到元代,兽头一部分沿袭宋金风格,实例如山西芮城永乐宫重阳殿兽头(图30);此外,也出现了进一步立体化的实例,较为典型的例子即永乐宫三清殿兽头(图31)。三清殿庑殿顶,四角兽头作竖颈龙头样式,龙首高昂,上安双角,与前述宋金时期的兽头已有较大变化,已开明清垂兽样式的新风。

宋元时期古代建筑兽头使用及配置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兽头

使用的位置。正如前引耶律弘礼墓墓门和宁波东钱湖庙沟后石牌坊所示,除了垂脊、戗脊以外,在一些建筑的正脊两端,也往往使用兽头。古代建筑使用鸱吻,除构造、装饰功能外,也与标示建筑等级直接相关。^[25]在部分正脊两端不能使用鸱吻的建筑中,即在建筑正脊两端使用兽头。这一情况在宋元传世绘画、榆林窟西夏至元时期的壁画等材料中十分常见(图32、图33)。《营造法式》卷十三《瓦作制度》“用兽头等”条记载:“堂屋等正脊兽,亦以正脊层数为祖。其垂脊并降正脊兽一等用之。(原小字注:谓正脊兽高一尺四寸,垂脊兽高一尺二寸之类。)”这一记载不仅说明了古代建筑正脊两端使用兽头的做法,还明确规定正脊兽的尺寸较垂脊兽大。

结语

自北朝至唐代,中国古代建筑垂脊、戗脊端头的脊头瓦多以兽面纹样为主,迨至唐代中后期逐步向立体化的方向发展,完成了从脊头瓦到兽头的转变。辽宋金元时期,兽头进一步演化,例如辽、宋的兽头即呈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此外歇山殿顶垂脊、戗脊兽头的形态开始出现分化。发展到元代,兽头的形态进一步变化,开启了明清垂兽的新风。

本文对从脊头瓦到兽头的形态变化和宋元时期垂脊、戗脊兽头形态区别的分析,为未来古代建筑遗址瓦件的甄别、整理,以及考古发掘揭露的建筑遗址进行复原时屋顶样式判断,以至仿古建筑设计脊饰的设计,都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注:

[1] 祁英涛:《中国古代建筑的脊饰》,《文物》1978年第3期。

[2] 王子奇:《中国古代鸱尾的起源及其

初步发展》，《鸱尾，聆听天空的声音》，扶余：韩国国立扶余文化财研究所，2018年，第34-41页；王子奇：《北朝隋唐时期鸱尾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019年第1期。

[3]王勃：《中国兽面纹砖瓦的形成与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六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3-52页。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图版一一二。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邺城文物菁华》，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88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206号大殿基址及附属遗迹》，《考古》2023年第2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隋仁寿宫·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8-40页。按麟德殿是大明宫内较早完成的重要殿宇，其主体工程的完成当不晚于上元元年（674）。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李浪涛：《唐肃宗建陵出土一件兽面脊头瓦》，《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

[11]刘耀秦：《富平县宫里发现唐代砖瓦窑遗址》，《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西新出土文物选粹》，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115、116页。

[12]王绣主编：《魅力洛阳·河洛地区文物考古成果精华》，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82-83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年。

[1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15]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八连城：2004-2009年度渤海国东京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16]一般认为，西古城即中京显德府，亦即《新唐书·地理志》记“天宝中王所都”的显州；天宝末自中京徙上京，“贞元时，东南徙东京”即贞元元年（785）从上京迁东京龙原府即八连城，至8世纪末，又迁回上京，直至926年为辽所灭，渤海以上京为都未再改变。请参看魏存成《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51-132页。

[17]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铢积寸累：广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选萃》，文物出版社，2005年；南越王宫博物馆编：《南越国官署遗址：岭南两千年中心地》，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年。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辽祖陵黑龙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8年第3期。

[1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镇市文物处：《辽宁北镇市辽代耶律弘礼墓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4期。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9、307、337页，彩版八、图版六五、图版七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册第329页，彩版36，图版119。

[21]杨古城、龚国荣：《南宋石雕》，宁波出版社，2005年，第117-120页。

[22]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柴泽俊编著：《山西琉璃》，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11页，图版16、17。

[2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考古》2019年第7期。

[24]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安图县宝马城遗址2014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吉林安图县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考古》2018年第7期；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2015年发掘简报》，《文物》2021年第3期。

[25]请参看前引王子奇《中国古代鸱尾的起源及其初步发展》与《北朝隋唐时期鸱尾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五代至辽宋金元时期鸱吻的等级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已超出本文范围，容另文探讨。

附记：本文初稿写定于2017年6月，2023年8月补充了初稿写定后新发表的材料。文中的主要内容与学术认识在2017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二届“历史时期考古青年论坛”以题为《宋元时期建筑屋脊的艺术形象》的发言在会上宣读，得到了与会师友的意见与建议，谨表谢忱！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宋金时期大型祠庙建筑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批准号：24VJXG026]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隋唐洛阳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批准号：LSYZD2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子奇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副教授

100872

（本文责任编辑 初枢昊）